

新 闻

研 究

资 料



新 华 出 版 社

新闻研究资料 丛刊

一九八一年第三辑

(总第八辑)

新华出版社

新 闻 研 究 资 料

一九八一年第三辑

(总 第 八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丰 盛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05,000字

1981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203·014 定价：0.80元

目 录

陆定一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在延安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

关于中国青年报

回忆中国青年报的创建和成长……………张黎群 (9)》

在中国青年报的日日夜夜……………陈 模 (25)》

中国青年报诞生记……………王士谷 (38)》

新闻业务研究

张友渔同志当年写社论……………王 迪 (45)》

何谓社论——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张友渔 (52)》

张友渔同志当年写的社论选登：…………… (60)》

愿中央新贵自勉勿懈

民主的正轨

性格的写照……………蒋齐生 (65)》

漫画与报刊

近代报刊漫画……………毕克官 (68)》

回 忆 录

回忆抗战前夕在上海的两件事……………胡兰畦 (88)》

一·二八上海抗战目击记……………顾执中 (93)》

较场口事件在世界日报内部引起的一场争论…陈云阁 (108)》

怀念浦熙修同志

- 悼念浦熙修同志……………萨空了 (116)
深切的怀念……………陈铭德 邓季惺 (119)
敢为人民鼓与呼……………陈理源 (122)
怀念熙修大姐……………江 屏 (133)

华 侨 报 纸

- 缅甸华侨新闻事业记略……………黄重远 (135)
我与新仰光报……………徐四民 (161)
在新仰光报的工作片断
附：《本报六年》……………朱仲玉 (174)

新 闻 史 研 究

- 中国新闻业史的分期与起点……………王凤超 (184)
清末新闻法制的初步研究……………张宗厚 (194)

报 刊 史 料

- 排难创新的写照 不胜不休的记实
——介绍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纸……………张之华 (211)
上海的小报……………姚吉光 俞逸芬 (223)
清初的舆论与钞报
——近代中国报史初篇(续)……………潘贤模 (245)
文汇报创刊初期……………徐耻痕 (263)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一)
……………方汉奇 谷长岭 冯 迈 (283)

陆定一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在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今天谈谈解放日报改版的问题，到会的都是“老解放”，请你们也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到现在已经39年了，我个人有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我就讲讲我所要讲的吧。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整风运动根本上是反对王明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整顿全党的党风、学风、文风。

这件事情为什么到1942年才做？王明是1931年登台的，他的背后就是米夫，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他是苏联共产党里大国主义、“老子党”那么一种思想的代表之一。他要控制中国的党和红军，利用王明这个集团来控制。王明集团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他们的人数不到二十九人，是二十八个半。我们这些人就是另外一个路线了，被他们叫做“调和路线”的。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中央委员，米夫要他们参加，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支部之一，不能不服从，他们就参加了。选举实际上也是米夫指定的，他们

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而且其主要人物还当了政治局委员。总书记是向忠发，他是个工人。他在立三路线时就是书记，到了王明上台还是书记，但实权在王明手里。王明后来去莫斯科，当了共产国际拉丁美洲部的部长，国内第一把交椅就是博古了。最近有一本书，讲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盛忠亮写的（署名叫盛岳），那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他回到中国，当了上海中央局书记，以后他被捕，被捕后就叛变，到陈立夫那里去了。王明集团上台以后，把党风搞坏了。从前我们党内、团内很少有人叛变，被捕了也不叛变，宁死不叛变。到了他们上台以后，叛变的就多了。有些人是那么想的：我们辛辛苦苦的干什么，拍拍马屁就行了嘛！拍了米夫的马屁，一下子就可以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个人主义的想法，侵蚀到党内来了。

王明他们上台后，钦差大臣满天飞，到一个地方烂一个地方，中央苏区，他们去的人最多，用路线斗争的名义打击了许多干部，用肃反的名义杀害了许多干部，最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方志敏创立的赣东北苏区，他们派去了一个名叫曾洪易的人，也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方志敏那个地区本来领导得很好，这个人去了之后，方志敏虽然没有被杀掉，但是他领导的那个地区垮了。方志敏被捕就义，曾洪易叛变投敌。给鄂豫皖苏区派去的“中央代表”是张国焘。张国焘这个人老机会主义者，《周恩来选集》里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同志们可以看看，那段时间里我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就是三个人：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当时派去鄂豫皖的还有沈泽民、陈昌浩。张国焘等在那

里控制了党权、政权、军权，以“肃清改组派”的名义，杀害苏区的创造者，被杀的第一个人叫许继盛。结果鄂豫皖也垮掉了。派到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的叫夏曦，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是右派——陈独秀派，到莫斯科学习，就变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在湘鄂西杀了很多的人，周逸群、段德昌这些创造根据地的人，都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杀掉了，结果这个苏区也垮了，总之他们派人到一个地方烂一个地方，一直到1935年1月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决议里边讲，王明控制的中央，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但是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这点我要讲一讲，当时指挥军事的，一个是博古，一个是李德（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们指挥反五次“围剿”战争，失败了。在长征路程中，还给莫斯科打电报，汇报行动情况，和得到指示，后来电台在长征途中丢掉了，同共产国际联系不上了，底下的同志，军队的干部，觉得这样搞下去不行，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军队，所以决议里边讲军事路线错了，把领导军事的人改变了。为什么说政治路线还是正确的呢？那是一个妥协。在长征过程中，天天行军，没有功夫和可能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所以只能妥协。遵义会议决议有妥协的地方，这个妥协是故意的，也是必要的。张闻天上台当中央总书记，这也是个妥协。张闻天上台就不指挥军事了，军事由毛主席来指挥了。遵义会议后，再经过同张国焘的一场斗争，我们就到了陕甘宁边区。

我讲讲为什么别的苏区垮台了，还留下一个陕甘宁边区？因为王明集团人数太少了，钦差大臣派不过来，隔了几

年，执行王明路线的人，把苏区的创造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这一批人都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我这次碰到习仲勋同志，问他：“那时，假如中央红军不到你们那里，你们结果怎样？”他说：“只要晚来四天，我们的头就没有了。”中央红军到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把刘志丹同志他们释放出来。假如我们晚到几天，连陕甘宁边区都没有了！你们没经过王明路线，我们讲讲这段历史很有味道啊！可以知道创业的艰难，知道王明路线的毒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假如毛主席不上井冈山，那我们的革命就可能完全失败。毛主席因为秋收起义，被中央解除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请看周恩来选集上卷172页）。他领导秋收起义后，迅即上了井冈山，上井冈山的意义很大，以后才有别的苏区（以前的海陆丰苏区已失败），才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这些人才会保留下来。如果没有1935年的遵义会议，长征一定失败。如果不坚决同张国焘分家，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到不了陕甘宁。如果不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放出来，陕甘宁边区也就没有了，我们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革命过程里有许多偶然性的事情，这种偶然性，来自必然性。必然性就是中国人民要革命。王明把干部一批批杀掉，但这个军队仍然能打仗，农民还是要参加红军。我问过贺龙同志：“你们那支军队（指二方面军），在长征时候，党的组织怎么样？干部怎么样？”贺龙同志说：“党员几乎杀光了！我们直属队只剩几个党员了。”可是照样行军作战，照样要警戒就警戒，要烧饭就烧饭，第二天要急行军还是急行军。所以，这个革命阻挡不住。农民他不管怎么样，死了也要革命，就

是为了土地不怕死。外边国民党杀来不怕，内部王明杀也不怕，就是要革命。

遵义会议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估计上作了妥协，一直到1942年整风，才开始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清算王明路线。当时党搞什么去了呢？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斗争，等到抗日已经发动了，政治局面已经定了，然后才能腾出时间来清算第一次王明路线，这离遵义会议已经七年之久了。解放日报改版就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并使报纸为整风运动服务。那时候军权已经不在王明集团手中了，但是在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中，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还有大权。他们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还没有觉悟，全党的同志，对于王明路线是否错误和错在哪里，没有清楚的认识。这样的党领导革命，就很危险。所以整风运动是极其必要的。延安女大，是王明当校长，他每次去讲课，警卫员抱着一大堆书，他讲课时翻书，翻翻这本，翻翻那本，听课的人觉得：哎！这个人很有学问，马克思理论水平真高，真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整风的时候，女大改成党校的一个部分，王明调动了工作。这时，中央党校校长也有了更动。中央派彭真同志去当中央党校校长，原校长邓发同志调任其他工作。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何凯丰，那时候准备开七大，中央把我从前线调回来了。让我去当中央党校教务长，还没到任，就调到报馆去了。1942年4月3日开始整风。我是先办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8月才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现在讲讲解放日报的改版吧，记不清的或者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补充、改正。

解放日报改版前后比较起来，有几个不同：

第一，政治主张问题，改版前后是不同的。比如讲政治社论，在改版以前，总是写“蒋委员长”怎么怎么讲的，共产党怎么怎么讲的，说来说去两个主张好象都是一样。关于自卫军（即民兵），报纸竟然主张地主也可以参加自卫军。总而言之，报纸上有许多是王明路线的残余。当时的王明路线是一条右倾的路线，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蒋介石抬得很高，把共产党降为他的马前卒。这就是陈独秀路线在抗日时期的再版。在社论、消息中可以看得出来，解放日报还登过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反对革命的文章。这都是中央所以决定解放日报改版的原因。

改版以后改变了，不再是王明路线的残余，而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曲线救国”等等，最后，发展到揭露美帝国主义。这种揭露，不是说空话，而是有事实，有道理，有分寸的。

第二，关于写社论问题。博古当社长，他要求每天写一篇社论。在我以前的总编辑叫杨松，他是个好同志，服从了博古，一天写一篇社论。据说写了二十九篇（或是二十七篇），身体就垮台了，不久就逝世了。我去以后，博古也要我每天写一篇社论。他跟我讲一些东西很有味道，不妨复述一下，他说：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等商量商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张季鸾说：“我们大公报的社

论，只管二十四小时，第二天就可以擦屁股。”我对博古说：第一，我不做杨松；第二，我的社论十年以后还要经得起审查，不能象大公报的社论只管二十四小时。他对我也没办法，没有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调和路线。从此以后，社论就不是一天一篇了，社论有人喜欢看了。

第三，报纸同地方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改版以前，报纸同地方党和群众是没有什么组织关系的。解放日报编委无人参加西北局的会议，在县、区、乡没有通讯员。地方党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什么，人民生活怎么样，很难知道。因为这样，所以派出去的记者，虽然很有才华，也会写出有价值的报导，但也有一些新闻，是道听途说，或者凭主观写稿，写了也不给当地党组织审查，往往失实，有时闹出笑话。改版以后，余光生当副总编辑，他专同西北局联系，参加西北局的会议，在那里组织社论、文章；从报馆里派记者出去采访些重要问题；报社在县、区、乡设通讯员。情况开始有所改进，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所办不到的，叫做“全党办报”。

第四，那时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们都是青年，二十几岁，其中有些人受了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当时在新闻学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是所谓“性质论”Quality theory认为新闻就是某种性质的本身，这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完全相反。自己的稿子，虽然不尽不实，也不许别人改，说“我写的稿子有趣味性，你得登，否则你就违背了新闻学原理”。这种事情发生多了，我准备写一篇关于新闻学方面的文章，解决这个问题，只写了一段，还想写下去，没有写

成。

办党报首先要看什么路线，当时就看是王明路线还是毛泽东路线；第二，报纸一定要同党和群众有联系。新闻记者不做“无冕之王”，而是要请教党委和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多听听他们的意见，目的是做到“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样的新闻就有价值了。

第五，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在当时争论的是要“快”。我当然赞成快。可是安塞发生的事情，传到延安，要经过毛驴子传过来，快不了啊！当时还可以从党中央得到各根据地的某些情况。也能接收点外面的电报，如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等的电讯。但是，这些也不能照抄啊，要用自己的观点加以改写。同样一件事，报导要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

在延安时只有一个报纸，一个电台。现在情况不同了，宣传工具多了。有卫星转播，有电报、电话，有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以及先进的印刷工具，还有电视，新闻的采访和传播，都可以快了。

第六，还有个问题也值得讲一讲，就是抢救运动。抢救运动在报社也搞了，后来停下来。很多机关把青年打得很惨！解放日报损失较轻一些。

就这些了，关于报纸改版前后情形，今天到会的同志们比我记得更好，请你们来讲吧。

回忆中国青年报的创建和成长

张 黎 群

中国青年报于1951年4月27日创刊以来，于今30年了。我是参与创建这份报的第一批“青年报人”之一，整个五十年代都和同志们并肩战斗，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她。今天，我怀着深厚的感情来纪念她进入“而立”之年。

一、创业维艰

青年团要创办团报，对全团来说是件大事。从1946年各解放区试建青年团到1949年正式建立青年团之日起，团中央就一再考虑要出版团报。青年团的主要领导人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李昌等同志，曾经设想将双周刊的《中国青年》杂志慢慢改为周刊，再由周刊逐渐过渡到日报，但是，这一着没有成功。

1950年8月，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请示，提出办团报的计划是分三步走，从出三日刊到二日刊，然后过渡到日报。实践证明，这个稳扎稳打前进不已的作法是正确的。

1950年12月29日团中央又就办团报的方案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党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胡乔木、杨尚昆同志传阅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出版中国青年报。当时对团报的性质、任务、方

针、作法、干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所作的明确规定，后来集中反映在1951年4月26日青年团中央关于出版中国青年报的决定里。报纸的总任务、总目标、总方针，就是要善于团结教育青年一代，天天代表团中央与群众见面，使她成为教育青年成才的良师益友，成为代表青年说话的喉舌，成为指导全团工作的有力武器，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工具。

创办中国青年报，当时有三大难题横亘在前进的道路上：办报干部非常不足，办报经验非常欠缺，办报物质基础非常薄弱。

事在人为。同志们兵分两路，积极进行筹备。一路在北京，以蒋南翔同志为首，定方案，选人才，建立中国青年报编辑委员会，由杨述、韦君宜、李庚、方群、吴佩纶组成，具体负责团报编辑工作。另一路，以冯文彬、李昌同志为首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参观、学习和研究《共青团真理报》的办报经验。我花了较多的时间，借重刘宾雁同志娴熟的俄文翻译才能，在共青团真理报社进行学习。回国后将访问笔记整理成册，题为《苏联青年团真理报编辑工作问题》，报社同志人手一册，以资借鉴。

1951年春季，正义路三号青年团中央大院灰楼的一层，是中国青年报社活动中心。编辑部、行政、后勤，全部都在那里办事情。那时全报社工作干部平均年龄大约21岁，5位总编辑、秘书长都只有30岁左右的光景。全社领导核心形成一个拳头。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出报准备工作，热气腾腾。他们有计划地、刻苦地学习新闻业务，请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同志讲授办报经验；他们

一丝不苟地试办每期报纸；他们对待各项工作，不做好不罢休，常常通宵达旦干。当时报社干部和团中央干部是杂居一处的，学生部长何礼同志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黎群，你们报社那些娃娃，半夜前收工好不好！”

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和全国青年见面了。本来是预定在“五·四”青年节出版的。我对南翔同志说：“五·四是个好日子，出报选个黄道吉日”。他说：“不要去占‘五·一’、‘五·四’了，好日子大家都要抢，你定个4月27日，开周年纪念会，不和别家打架，这恐怕也是个好日子！”

当着中国青年报迈步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口号响彻全国，鼓舞人心。中国人民和青年何等渴望思想的引导呵！我们审时度势，根据团中央的提示，向党中央送上请求于1956年元旦改出日报的报告，迅速得到了批准。要办好日报也还有很多困难，如，由于三日刊、双日刊的工作环境而形成的时间观念不强和报纸杂志化的面孔，就是一个要费劲才能纠正的习惯。对此，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共同制定了这么一个口号：“为办好一张广大工农兵青年所喜爱的具有战斗性的日报而斗争！”于是，全国各地的记者出动了，驻北京的编辑出动了，总编辑、部主任出动了。大家到群众中去搜集、了解、倾听他们的要求、愿望和呼声。当着这些青年报人回到海运仓的“大白屋”来时，出版日报之仗怎么打，心中有数了；打好这一仗的信心增强了；进行革新的决心更大了。

五年来，办团报这支年轻队伍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他

们克服了由于经验缺乏而带来的困难，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一种勤奋学习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热爱团报工作和献身团报事业的品德。

1955年迎接出版日报的编委会和各部主任这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核心成员是：张黎群、陈模、钟沛璋、徐君曼、纪云龙、余世光、徐才、刘宾雁、吴一铨、丁望、王士谷、娄霜、王剑清、余新、王慎之（在这之前还有陈绪宗、邢方群）等。全报社组成了以总编辑、各部主任和编辑秘书为骨干的业务指挥系统；组成了以社长、秘书长、行政各科长、厂长为骨干的有管理能力的行政指挥系统；组成了以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人事部门为骨干的政治工作系统。

1956年元旦，中国青年报进入全国各大日报的行列了！全国青年们热烈欢迎她，突出反映在报纸的发行数字长期稳定而且不断地提高。

二、人才难得

办中国青年报的是一支青年人组成的队伍。1951年创刊叫初战，当时平均年龄21岁。1956年办日报时，平均年龄26岁。面对这种人员结构情况，邓拓同志对我说过：“你们是年青人办大报纸，人小本事大。”范长江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这么年青的一支人马办中国青年报这样全国性的报纸，在报史上是罕见的。”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五十年代的中国，是各项建设事业全面欣欣向荣的年代。整个历史的前进步伐，一代青年成长的步伐，向青年报提出的希望，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远远超过我们的水平。办